

Interpreters and Interpreting: Shifting the Balance?

By Franz Pöchhacker

Translated by HE Jiaying

Received: February 5, 2024

Accepted: February 10, 2024

Published: March 31,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Franz Pöchhacker, trans. HE Jiaying. (2024). Interpreters and Interpreting: Shifting the Balanc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1), 041–050,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05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05>

Abstract: The role of interpreters has been shaped by changing social contexts throughout the millennial history of this occupation, but demographic, educational, leg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have accelerated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and given rise to new forms of interpreting with the potential of reshaping the way interpreting is conceived. This essay aims at providing a broad-based overview of major changes (‘shifts’) with regard to such features as social status and domain, mode and modality as well as process-related characteristics like human agency, immediacy and the nature of the language(s) involved. In particular, the looming transformations engendered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ill be analyzed with regard to the interplay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Under the headings of immediacy, linguality and agency, new forms of technology-based interpreting will be discussed and seen to challenge deeply rooted assumptions about interpreting as a task, with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for the role of the human agent.

Keywords: Context; agency; immediacy; technology; modality

Sourc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Translator*, Volume 28, Issue 2, 2022

Notes on the author: Franz Pöchhacker is Professor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at the Centr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With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i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his interests have expanded over the years to include issues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media interpreting, and community interpreting in healthcare, social service, and asylum settings. His more recent work involves such technology-based forms of interpreting as video remote and speech-to-text interpreting. He has lectured and published widely, his English books including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2002),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2004/3/2022), and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2015). He is co-editor, with Minhua Liu, of *Interpre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Interpreting*.

Notes on the translator: HE Jiaying is now a Teaching Assistant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CQUP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volve interpreting and English Grammar.

口譯者與口譯：變化的平衡？

弗朗茲·波赫哈克/文 何家星/譯

摘要：在長達千年的歷史中，口譯者身份由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塑造而成。20世紀後期以來，人口、教育、法律和技術的迅猛發展催生了新的口譯形式，極有可能讓口譯概念得以重塑。本文旨在闡述社會地位與工作領域、口譯工作模式與語言模態的重大變化（改變），以及口譯過程相關的人類能動性、即時性和語言本質等特征，並特別關注人類譯者與機器的相互作用以分析技術進步即將帶來的轉變。在即時性、語言性和能動性的標題下，文章將討論基於技術的口譯新形式，這些新形式挑戰了關於口譯任務的固有假設，對口譯者能動性的研討有著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語境；能動性；即時性；技術；模態

來源：原文原載於《翻譯者》（*The Translator*）2022年第28卷第2期。

作者簡介：弗朗茲·波赫哈克（Franz Pöchhacker）是維也納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口譯研究教授。憑借在會議口譯方面的專業訓練和經驗，他的興趣多年來已經擴大到包括口譯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的問題，包括媒體口譯和醫療保健、社會服務和庇護所設置中的社區口譯。他最近的工作涉及基於技術的口譯形式，如視頻遠程和語音轉文本口譯。他廣泛授課和著述，其英文書籍包括《口譯研究讀本》（2002年）、《口譯研究概論》（2004/3/2022年）和《勞特利奇口譯研究百科全書》（2015年）。他還與劉敏華合作編輯了《口譯：口譯研究與實踐國際期刊》。

譯者簡介：何家星，重慶郵電大學外國語學院助教，研究興趣包括口譯及英語語法。

引言

將口譯視為翻譯活動的一種特殊形式開展反思的歷史相對口譯活動本身而言要短很多，因為口譯活動可追溯至數千年前。本專題集旨在思考口譯者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的角色，因此我們應考慮相應的時間框架。我們既可採用長期的歷史視角，亦可專注當今的形勢和發展。雖然我的討論重點在後者，但也會簡要提及前者，以便指出該課題值得討論的宏闊範疇。

變化絕非新現象，而是始終持續發生和普遍存在的。的確，口譯者環境改變的觀點似乎過於寬泛，因而難以進行更系統的分析。有鑒於此，我將把視角集中到關乎研究重點和研究方向的更為激進的轉變。比起路徑圖、趨勢圖或轉向圖，我的示意圖更像一種衡器，或一對天平，以比喻的方式說明某議題在重要性或研究熱度上的相對變化。天平的形象意味著一種二元觀點，但它也與延伸在相反兩極之間的連續統的概念相容。連續統是斯內爾·霍恩比（1988）為筆譯研究提出的觀點，也在我的口譯研究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

(Pöchhacker 2022: 25)。

在此背景下,我將首先回顧標準或變量,用或多或少的二元論術語來界定口譯概念。這裏,我們需要一個定義作為出發點和進一步開展概念分析和討論的基礎。

一、定義和特征

定義口譯的便捷方式是將其解讀為「一種翻譯形式」,用大寫的「T」表示翻譯活動的上位詞概念。這將口譯嵌入翻譯這一學術領域,並將口譯任務限制在既定特征的範疇內(Pöchhacker 2022: 11–13)。還有一種選擇是製定一個更自主的定義。為此,我曾提出將「口譯」從翻譯意義上理解為最基本的意思是「用另一種語言說出剛才說的話」(Pöchhacker 2019: 46),其中的「說」(say)是以更廣泛的「表達」(express)或「交流」(communicate)的含義使用的。在這方面,詞典上的那些定義似乎不太有用,它們將「口譯」(interpret)的不及物形式(to interpret)定義為「擔任口譯者」(Merriam-Webster 2019)。然而,對於我們的目的來說,這種表述是有用的,因為它有助於重申對口譯和口譯者之間內在關係的關注,也就是任務和行動主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如圖 1 所示,作為當前討論主要參考點的「任務」或活動與執行它的「行動主體」密不可分;而行動主體反過來又與翻譯任務和翻譯人員密切相關。口譯者嵌入在口譯活動發生的特定「背景」中,並在不同的方面塑造了任務的特征和行動主體的身份和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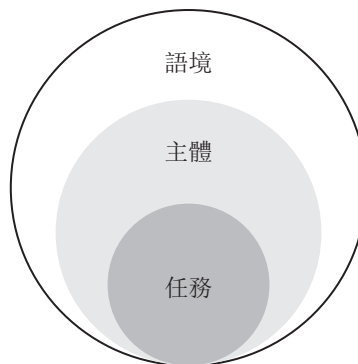


圖 1 分析關係的概念化

語境的概念對於理解口譯來說至關重要,但其定義模糊,需要更多解釋。一個普遍認同的觀點是這個概念是多層次的。儘管其外部邊界很難確定,但可以安全地假設一個社會文化(sociocultural)層,將重點放在(特定)社會中的口譯上。在特定的社會機構(如教育或醫療保健系統)中觀察口譯會產生一個語境的製度(institutional)層,其中存在著更多具體的設定(settings)。在這種(或多或少通用的)設定中,情境的層次包括交互發生的空間和物理環境,以及參與交互的主體。最終,語境的語言(linguistic)(或者是交際)層涉及交際互動中使用的表達資源。這些資源是多模態的,並形成了一個時間上的連續統,因此,早期表達的內容塑造了後續話語的產生和理解。根據所採用的理論框架,這可以通過「上下文」(co-text)或「先在語境」(prior context)等術語來表達。然而,為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將重點放在「外部社會層」(social)而不是語境的語言層。

語境的情景(situational)層有助於澄清本討論稍後使用的一個重要概念,也就是即時性(immediacy)。

在上述口譯定義中,「剛才說過的話」指的是時間意義上的即時性:根據定義,就像一次交際互動展開一樣,口譯是「實時」發生的。用現代的話來說,口譯是「現場直播」的。此外,口譯的時間即時性特征(與筆譯相反)傳統上也暗示了「場所的統一性」。因此,口譯被解釋為發生在此時此地的活動,所有參與者都共同出現在特定的情境中。

從上述定義中可以得出的另一個重要結論是該任務的跨語際(*interlingual*)性質。這反過來又與另一個重要假設有關係,即口譯是由人類主體(*human agent*)執行的。實際上,語言的任何使用長期以來都被認為本質上與人類相關,從而排除了非人類主體。在口譯研究中使用能動性(*agency*)的概念時,它通常指的是人類口譯者在互動中的積極參與程度。在這個意義上,能動性與口譯者角色的主題密切相關,特別是在社區環境中的口譯中(Angelelli 2004)。雖然口譯者的能動性程度或角色構成了本文的主要議題,但它不是當前討論的中心。相反,我對主體的興趣突顯了一個明顯的暗示,即假設口譯是一項跨語言任務——也就是說,執行此任務的主體的基本要求是「懂得」(即或多或少精通)兩種語言。

後面我們將談到,口譯定義中的語言本質比作為一種語際任務的口譯定義的要複雜得多。在語言性(*linguality*)這個標題下,我將討論這樣一個事實,即語言存在於不同模態中(口頭、書面、手語)的事實,也一定會影響我們對口譯的理解。

與即時性和語言性的概念相比,本研究極少談及人們常說的關於翻譯任務的定義性特征——此觀點認為兩種說話行為之間存在著內容而非形式的相似或相同的關係。雖然像「對等」或「忠實」這樣的表達令人擔憂(Leal 2012),但口譯是對所說內容的某種忠實再現的假設在很大程度上是毋庸置疑的。由哈裏斯(1990: 118)闡明的「誠實發言人」的規範似乎無可爭議。同樣,賽頓(2015)指出,忠實的概念空間是多維的,從準確性和完整性一直延伸到可信度和可靠性,還涉及內容和意圖。除了構成口譯內在定義的一套定義標準之外,還有一些關於主體、任務和語境的描述性特征。這些可以並已經被用來區分口譯的不同表現形式,並構成了一個豐富多樣的領域。主要的例子包括專業口譯與非專業口譯、交替傳譯與同聲傳譯,以及會議口譯與對話口譯。在這些概念維度上,我們可以觀察到口譯中一些長期存在的轉變。在後續章節中,我將簡要討論這些問題,研究從連續統的一端向另一端(通常也是相反方向)轉化的個體特征。

二、早期的轉變

在社會文化語境的最廣泛層面,使用不同語言的群體(或其成員)之間的聯繫讓口譯者的需求在各個時代都不斷增加。貿易、外交和戰爭是重要的社會間接觸場景,口譯者在社會和國家(代表)之間發揮作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的口譯活動便是如此,這期間國際會議口譯的專業化進程令人印象深刻(Seleskovitch, 1978)。除了多民族社會、帝國和殖民統治下的社會,這方面的重大轉變只發生在本世紀後半葉。國際流動性和移民的增加讓更多的多語種和多文化社會的出現,尤其是在「西方」福利國家,政府有新的溝通(和口譯)的需求。在20世紀80年代,「社區口譯」這一概念在英國得到廣泛使用(Pöchhacker 1999: 126),強調了口譯是一種在特定(具有語言和文化多樣性的)社區中開展的行為。

如上所述,從國家間口譯到社會內部口譯的轉變,使人們特別關注口譯者角色的複雜性:與具有同等或可比地位(如國家、機構、職業等)的代表不同,社區口譯基本上由個人代表自己行事,其口譯行為通常涉及

某一機構代表和該機構地位所帶來的權力。這種權力的不對稱性對口譯者積極參與交流的程度提出了特殊要求。

20 世紀後期口譯從國際領域到社會內部領域的重要轉變,都與口譯行為主體形象以及任務的性質等方面的轉變相關。就各種轉變所依托的連續統而言,這裏所提及的轉變包括專業地位、互動形式、多語種能力和口譯工作模式。

從長遠來看,從古代到 20 世紀,口譯者的身份和地位最根本的變化是從偶然的雙語者轉變為被認可授權的專家。前述案例的偶然性具有雙重原因:由於特定的環境,偶然習得了兩種語言;又由於現實環境被招為口譯者。眾所周知,產生偶然雙語者(因此也產生偶然口譯者)的環境包括敵方俘虜和殖民以及各種形式的移民。相比之下,專家的身份地位通常只出於政策之因,由特定制度框架中的刻意措施而產生。因西方大國為處理奧斯曼帝國事務而受教育的青年語言學生(*jeunes de langues*)(Rothman 2015)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有關口譯任務完成質量的專業訓練無疑是專業化進程中的核心要素。在這一方面,二十世紀(後半葉)是口譯從偶然的日常活動轉變為專業職業的時代。這種專業化大多與國際會議口譯有關,二十世紀後期以降,從法庭口譯到手語傳譯的其他專業領域也出現了類似的發展。

從非職業到具有一定自主權的專業譯者地位連續統的轉變,與典型的語言間互動模式密切相關。數世紀以來,貿易、外交和軍事領域的語言接觸多為雙邊場景,就如雙方進行了一場「對話」。儘管有例如天主教理事會或 1815 年維也納會議的例外,但直到 20 世紀初,有組織的多邊接觸和會議都很少。多邊主義並不一定意味或要求多語種,但正如拜戈裏·賈隆(2014: 19-24)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多邊主義的承諾確實導致了國際聯盟和日內瓦國際勞工組織等機構的多語種化。參加國際會議的個人缺乏多語種能力,於是產生了對會議口譯的需求。因此,從雙邊對話到多邊會議的轉變,為會議口譯者的專業化提供了基礎。

大約一個世紀後,以英語為主的多語種能力的快速普及,讓二十世紀轉向了使用多語種口譯的多邊會議。隨著英語成為世界各地各行各業的主導通用語,多邊會議又回到二十世紀前的通用語使用模式,對口譯的要求更加明確,通常限定在特定語言和作為通用語的英語之間。與此同時,社區中對話口譯的湧現可以說是對話場景的整體轉變,以及在雙語交流場景中口譯優勢的「回歸」。

上述變化也可與口譯不同時期的實踐方式有關。二十世紀向多語種多邊會議的轉變再次在從連續口譯向同聲傳譯的轉變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反過來又極大地推動了培訓工作和早期研究。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技術第一次成為影響口譯實踐的關鍵因素。同時,手語傳譯服務的制度化也加強了口譯整體趨向同聲傳譯的轉變。

對比古時數百年的口譯與二十世紀的口譯實踐可見,從交替傳譯到同聲傳譯的轉變是顯著的,也是根本的。但當我們聚焦過去 50 多年的時間時發現,這種轉變似乎也發生了逆轉,即從同聲傳譯回到交替傳譯模式。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從國際交流到基於社區的溝通需求的轉變,由專業人員到偶然口譯者的轉變,以及由會議場景到面對面對話的轉變。有趣的是,技術在這裏也發揮了作用。例如,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使用電話設備開展口譯,驅使口譯者以交替傳譯的方式工作;這也適用於近期的技術介質形式的口譯,之後將進一步詳論。與前述關注口譯任務的描述性特征研究不同,接下來本研究將關注口譯概念的典型特征,以即時性、語言性和能動性為題討論口譯的系列轉變。

三、即時性

過去 100 年,除了語音產生的聲波,口頭翻譯一直沒有借助任何介質。在這個意義上,口譯本質上是無中介的,所有互動方都應「在聽力範圍內」,共同出現在指定場景中。因此,物理共處意義上的即時性是口譯媒介溝通的一個根深蒂固的假設。儘管 20 世紀 20 年代中期「電話」口譯的出現(Baigorri-Jalón 2014: 137)開始削弱口譯者在會議室物理存在的假設,但直到 20 世紀下半葉,口譯者遠程工作的設想才開始得以實現。隨著電話口譯先後引入澳大利亞、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視聽模式的遠程口譯(RI, remote interpreting)在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興起。然而,直至 20 世紀 90 年代,基於視頻會議的遠程口譯仍然受到技術(和費用)的限制(Mouzourakis 1996)。由於過去幾十年寬帶互聯網的快速擴張,視頻口譯在社區環境和國際會議中有了可行性(Braun 2015)。毫無疑問,主要依賴視覺的手語傳譯在視頻遠程口譯(VRI, video remote interpreting)的廣泛採用中發揮了先鋒作用(Napier 2022; Napier, Skinner and Braun 2018)。

基於視頻的遠程口頭翻譯自此有了三種發展方向:(1)傳統的現場會議中,同聲傳譯通過視頻會議進行,圖像僅傳輸給口譯者,歐盟理事會晚宴和體育相關活動(Seeber et al. 2019)就是很好的案例;(2)當遠程同聲傳譯(RSI, remote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通過虛擬平臺進行,且多數或所有參與者通過視聽接口連接會議時,同聲傳譯員不需要成為唯一的聲音發出者,儘管這是遠程同聲傳譯(RSI)在大多數同傳交付平臺中實現的方式;(3)在基於視頻會議的遠程對話口譯中,圖像傳輸實為雙向,而口譯在交替傳譯模式下進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安排能影響口譯的即時性和口譯者的「在場感」。遠程口譯(RI)類型 1 和 3 傾向於以接近現場條件的方式使用視頻會議技術:同聲傳譯(SI)輸出僅為音頻,而對話口譯者在交傳模式下保留了視覺和聽覺的存在。可見,類型 2 是最根本的創新,因為它構成了一種新型虛擬會議空間的一部分,在這一空間中,所有參會者的交流互動都通過技術連接了起來。未來沿著這些方向的發展將對口譯者在互動中的出現和「呈現」給其他參與者的方式產生重大影響。在遠程同聲傳譯(RSI)中,克服空間即時性界限的技術可以為口譯者的存在恢復更大的即時性(儘管是技術中介);另一方面,在視頻遠程口譯(VRI)中,切換到同聲傳譯模式(Pöchhacker 2014)可能會將社區口譯者減少到僅有聲音的存在,因為參與者的視覺監控會影響口譯者的口語表達,從而只會直接針對他們的直接對話者。

除了空間意義,即時性的概念更具有典型的時間意義,如「現場」或「實時」等技術術語便表現出這一屬性。這裏,使用數字技術傳輸和存儲口頭和/或手語語料再次對口譯源信息只能使用一次的定義標準提出了挑戰(Kade 1968; Pöchhacker 2022)。例如,在基於錄音的同聲傳譯連續工作模式中(Pöchhacker 2015),源語音實際上被聽到兩次。同樣,同傳譯員預覽視頻材料是新聞口譯中的常見做法。對此,鶴田(2011)描述了日本國家廣播公司 NHK 的成熟做法,也有學者(Xiao, Chen & Palmer 2015)討論了因準備時間不足而阻礙新聞廣播同聲傳譯成中國手語的有效性的一個因素。

總之,以視頻會議為代表的技術進步,一直在推動口譯的概念邊界發展。口譯或口譯的某些形式,曾經因其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即時性而被定義,如今再也不能說發生在「此時此地」。相反,口譯者可能會被納入一個碎片化的虛擬空間,或通過依賴數字聲音和圖像傳輸、錄製和重放技術來超越「實時」。

四、語言性

正如在定義的介紹部分所提到的,術語「語言性」(linguality)在這裏被用來表示語言使用的媒介以及語言轉換的性質。在關於區分口譯和筆譯的方法的建議中,卡德(1968)強調即時性而非口頭或書面語言模態(modality)。他用隨文夾註說明口譯源文本「通常」是口頭的,這為其他可能性留有余地,且並未嚴格將口譯等同於口語對口語或口頭翻譯(一些語言將這樣的表述納入基本術語)。最近 ISO 標準將「口譯」定義為以口頭或手語的形式提供信息,證明了這一選擇富有遠見(例如 ISO 2019)。與赫伯特(1952)和希裏耶夫(1979)等先行者一樣,卡德(1968)事實上也在其口譯概念中納入了傳統上被稱為視譯的內容(即書面源語文本的口頭呈現),但遺憾的是,目前的 ISO 標準尚未做到這一點。這一選擇意義重大,它不僅涉及口譯工作方式中是否需要某項技能,還強調口譯很可能涉及語言模態(modality)的轉變。跨模態或多模態原則顯然也為 ISO 定義所接受,因為手語信息大多被譯成口語,反之亦可。至於口語和書面語之間的區別,接受多模態也就意味著寫作可成為口譯過程的組成部分。圖 2 是從書面源文本到口語目標文本的語言模態轉換示意。圖中箭頭的顏色試圖反映原型的概念化,其中一個箭頭將口語源文本與書面源文本連接起來,甚至還標示了書面語到書面語的模態轉換,這一轉換形式可為聊天消息的即時翻譯所佐證。

儘管讓口譯者將口頭信息實時轉換為書面文本很不尋常,但這一工作模式實際上在 20 世紀 80 年代就由伊娃·帕裏斯提出,她是首篇會議口譯碩士論文的作者。她描述的「投影口譯」遠遠早於演示幻燈片的視頻投影儀的出現,相當於語音到文本的同聲傳譯,由於技術限制,由人工書寫在幻燈片上而非由高架投影儀完成。這種做法的現代版本是使用計算機鍵盤、速記鍵盤或語音識別系統(Stinson 2015)。出於特殊目的和特殊用戶人群的需求,語音轉文本口譯成為一種越來越普遍的做法,因為聾人或聽障人士(DHH)需在教育環境或現場活動中獲得口頭信息。重要的是,這種通信訪問服務,亦稱為語音寫作或實時字幕,通常是在語內將口頭信息轉換為同一語言的書面文本完成。將口語譯為文本的口譯歸入口譯概念之下,與口譯傳統的語際性(interlinguality)界定特征相沖突,引發了術語問題以及關於概念邊界的更根本的爭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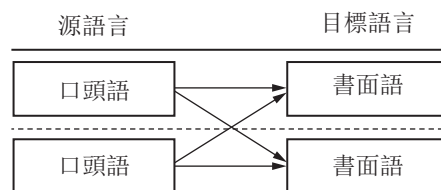


圖 2 口譯中的語言模態

在口譯被界定為「口頭翻譯」的情況下,其整套概念特征在語言中的分類和表達方式都取決於可用的詞匯資源。雖然這可能會使筆譯和口譯之間的術語區別變得更加困難,但也可以消弭區分的必要性,因為不同形式的翻譯活動被歸入一個單一的上義詞之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以簡單地談論「口語到文本翻譯」,並加上一個額外的限定詞,如「實時的」、「現場的」或「同時的」。在這個通用層面,術語的邏輯問題能通過雅各布森(1959/2000)的語內翻譯、語際翻譯和符間翻譯三重劃分來解決。如果語內翻譯被視作翻譯,那麼這也適用於作為一個獨立術語的口譯。至少在概念上,語內翻譯不是什麼奇怪的東西;懷疑甚至抵製

更有可能來自執著於清晰定義的專業團體。與此同時,社會團體的利益也能為統一術語甚至可能是專業方法提供理由:比聾人和聽障人群(DHH)更加多元的群體會認為,聽力受損者需要根據其聽力損失的性質和程度而獲得相應服務,比如譯成他們的母語或後天習得的手語,或者譯成口語的手語變體(如「音譯」),或者翻譯成該語言的書面形式。提供這種服務的人員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被視為口譯者,經過必要的培訓,同語種多模態口譯者甚至可能是同一人。

作為口譯服務的特定用戶群體,聾人也可能受益於一種特殊的口譯類型,該類型也與本文的目的有特殊關聯:聾人口譯者(Stone 2015)可能以接力模式工作,使聽力正常的口譯者的非母語手勢適應本國聾人用戶的需要。此種情況下的口譯既是語際的,也是語內的,通過口譯過程為特定目標群體的溝通需求服務。

這方面的另一案例是將釋義成易於理解的語言,這是為認知障礙者重譯書面文本的一個新舉措。這種實時進行的語內口譯過程(口語對口語)將口譯固有的即時性與特定的目標用戶導向結合起來。

無論是語內口譯還是語際口譯,所有上述口譯形式都對本文開頭製定的口譯定義構成了挑戰。對口譯行為需「使用另一種語言」的規定構建了一個概念邊界,排除了語內口譯形式。口譯由單一的跨語際實踐到包含語內實踐的轉變,標誌著從根本上背離了對這一活動的數個世紀以來的理解,這比即時性和語內性的轉變更為顯著,究其原因,或許是因其顛覆了人們所持口譯者雙語能力的陳見。畢竟,語音到文本和由難到易的語內口譯,可由單語者完美實現,聾人譯者就是極好的證明。放棄口譯者必須「說」(理解/知道/掌握)至少兩種語言的要求,無疑相當於一場概念上的劇變。然而,轉變正在發生,只要保留口譯的其他定義性特征,如實時進行和忠實再現,這一再定義便能為社會廣泛接受。類似的重新定義可以很容易實現:只需縮短本文開頭定義中的一個詞,即可放寬所謂「使用另一種語言」語際性要求,至少在英語中可將其替換為「使用其他語言」。

此外,語內口譯與傳統定義的調和可能得益於這樣一個事實,即除了聾人接力口譯外的所有語內口譯變體原則上也可以進行語際口譯(Davitti and Sandrelli 2020; Dawson and Romero-Fresco 2021)。如圖所示,在2019年初在維也納大學舉辦的一次國際歐盟項目會議上,比利時廣播公司正在使用語際實時字幕,展示了將語音轉寫為文本的口譯方式,會議上有關跨語言實時字幕培訓課程的英文演示同時被譯為德語字幕,以滿足與會聾人參會者的需求(圖3)。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服務的提供者是經過了大學培訓並從事會議工作的口譯,也是經過認證的語音轉文本的語內口譯者。



圖3 ILSA 培訓中的跨語言實時字幕(維也納,2019年2月21日)

五、能動性

口譯本質近期發生的變化只有通過使用數字技術才成為可能。同步交傳和 RSI、VRI 等遠程口譯形式就是例證。然而,所有以技術為中介的口譯任務本質上都依賴人類主體。此種轉變始於語音識別技術支持的語音轉文本口譯,這一過程由兩階段組成:第一階段是人類主體在模態內處理語內或語際任務,分別稱為「再表達」(Romero-Fresco 2011)和「轉換表達」(Pöchhacker and Remael 2019);第二階段是基於自動語音識別(ASR)系統的語音到文本跨模態轉換。除非向 ASR 系統提供輸入的再表達者或轉換表達者設法監控並在必要時糾正 ASR 輸出,否則用戶接收的最終產品中的一部分將不再由人類主體創建。

由於 ASR 和語音處理技術的進一步進展,第一階段可能會由機器接管,將語音轉文本的語內口譯變成一個全自動的單階段過程。在語際轉換階段,ASR 的輸出需輸入至機器翻譯引擎中。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是,機器輸出的文本需要人工譯後編輯,特別是對譯品質量要求高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在這樣的配置中,翻譯過程再次由兩個階段組成,核心任務由機器完成,而人類譯者則負責潤色。

最後,當語音轉文本的語際口譯所需的 ASR 和機器翻譯系統得到文本轉語音的語音合成器補充時,這個分為三階段的口譯過程就由機器完成。(該描述顯然基於傳統的機器口譯階次模型,而未考慮正在進行的「端到端」語音翻譯的研製。)當翻譯材料更為複雜,對口譯質量有更高要求時,這種全自動語音到語音翻譯(FAST)很可能仍然需要人工譯後編輯。這一道工序相當於語內同傳人員的影子糾錯過程(Riccardi 2015)。在這種情況下,跨語言口譯仍然是一個復合過程,機器執行語際任務,人工同傳在語內工作,創建一個對用戶更友好的最終版本。雖然這一安排似乎充滿未來感,但與聾啞口譯者從聽力正常的同事那裏接力的方式相當,該同事的工作是將母語口語轉換為後天習得的手語。從更廣泛的層面上來說,口譯任務的安排與機器翻譯的一般用途具有相似的屬性。曾經完全由人類完成的任務,現在通過利用機器的計算能力來完成。

六、總結

目前,從轉變的角度來描述口譯概念化和專業實踐的變化存在局限性。最明顯的是雙語特征的概念過於簡單化,討論避免了容易導致二分觀點的那些特征,也避免談及更多漸進的變化,例如會議口譯者的工作場所從口譯隔間轉至會場中心再到家中。其次,過去發生的轉變不一定只朝一個方向移動,而是像鐘擺一般可逆。再次,何為「過去」和何為「當下」的區別值得懷疑。雖然後者可被認為是「正在進行」,但是文中討論的某些轉變可追溯到幾十年前,而另一些轉變則剛剛發生。此外,對過去和當下轉變的「分析」並未基於定量指標或測算,而是基於專業和學術文獻及對行業發展的長期觀察所獲取的印象概括。理想情況下,這些簡化概要的部分內容可在系統收集的實證數據基礎上進行檢視。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界定的各種變化有助於就口譯本質和口譯者角色及身份得出一些更廣泛的結論。首先,口譯不是一種穩定的、統一的現象,而是在其千年的發展史中反復經歷了重大變化,因為它本身就深深植根於不斷發展的社會實踐和不斷變化的語境中。與早期相比,當下最明顯的不同是變化的速度和範



圍。從未經訓練的口譯者到專業口譯者,從交替傳譯到同聲傳譯,可視為兩個相互關聯的維度。這樣的轉變可能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在二十世紀進入相對穩定期。相比之下,近期的變化涉及更多維度,這些維度往往相互勾連,引發不斷迭代更新的口譯實踐。從基於鍵盤的字幕製作到基於重述的語音到文本的轉寫,再到帶有譯後編輯的自動語音識別,以及語音轉文本的語際口譯的引入,這一系列的變化便是一個典型案例。此外,變化更加多維的事實極易帶來連鎖反應並引發進一步的變動。

正在發生的變化之所以被認為影響特別深遠,還有一個原因與所涉及的概念特征有關:不同於諸如口譯實踐的場景或互動形式等描述性特征,一些轉變影響了口譯本身根深蒂固的定義性特征。空間即時性轉變意味著口譯服務的交付模式而非內容實質發生改變,與此相異的是,在語言性這一話題範疇中,我們觀察到了某些本質性變化,譬如口譯過程的產品形式可能是書面語,並且在這一過程中譯者僅使用了本族語而未開展跨語際口譯,這意味著口譯者可能只會一種語言,而無須精通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

無論是多語種還是單語種,完成這些跨模態語內口譯任務的譯者仍然是人類,儘管他們的工作性質、社會身份和職業角色將被重新定義:口譯工作的描述將不再強調兩種不同語言的實時處理,口譯的工作性質將被界定為提供實時訪問服務,並幫助特定的目標用戶克服語言、文化、認知或感官上的溝通障礙。

最後,口譯者在執行任務時越來越依賴數字技術,這將非人類的成分引入口譯過程。無論是機器還是計算機軟件,這些技術都可用來支持人類口譯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人類譯者,或者在更簡單的工作中不再為人類能動性留下任何空間。從人類到機器的轉變無疑是我們所理解的口譯者身份的終極劇變。然而,它不會使人類口譯者的認知和情感技能變得多余。相反,在許多高風險的場景中,人工監督和譯後編輯無疑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人們的生命和自由處於危險之中。然而,從更根本的角度來看,目前的神經機器翻譯系統基本上利用和學習了已收錄的人類口譯表現。如果 FAST 系統要跟上不斷發展的語言規範並創造性地使用語言,口譯者的輸入將仍然至關重要,因為他們提供適合特定語境和目的的情景溝通解決方案。儘管環境和需求不斷變化,對技術的依賴程度也各不相同,人類譯者仍在口譯中發揮著主體的作用。正如本文試圖表明的那樣,我們根本無法簡單地確定這一角色將如何演變。

(Editors: JIANG Qing & KCJ)